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转型时代的中国财经战略论丛 

贸易增加值导向的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决策动机研究

袁其刚 张 伟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 转型时代的中国财经战略论丛 ▲

贸易增加值导向的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决策动机研究

袁其刚 张 伟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贸易增加值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决策动机研究/
袁其刚, 张伟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12
(转型时代的中国财经战略论丛)
ISBN 978-7-5218-0131-6

I. ①贸… II. ①袁…②张… III. ①对外投资-直接
投资-研究-中国 IV. ①F83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1887 号

责任编辑: 于海汛
责任校对: 刘 昕
责任印制: 李 鹏

贸易增加值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决策动机研究

袁其刚 张 伟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2.25 印张 200000 字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8-0131-6 定价: 43.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 举报热线: 010-88191661)

QQ: 2242791300 营销中心电话: 010-88191537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总序

转型时代的中国财经战略论丛

山东财经大学《转型时代的中国财经战略论丛》（以下简称《论丛》）系列学术专著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是山东财经大学与经济科学出版社合作推出的系列学术专著。

山东财经大学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办学规模较大、办学特色鲜明，以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为主，兼有文学、法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八大学科门类，在国内外具有较高声誉和知名度的财经类大学。学校于2011年7月4日由原山东经济学院和原山东财政学院合并组建而成，2012年6月9日正式揭牌。2012年8月23日，财政部、教育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在济南签署了共同建设山东财经大学的协议。2013年7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13年12月，学校入选山东省“省部共建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校科研整体水平得到较大跃升，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动性显著增强，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更加深入。近三年来，全校共获批国家级项目103项，教育部及其他省部级课题311项。学校参与了国家级协同创新平台中国财政发展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会计发展2011协同创新中心，承担建设各类省部级以上平台29个。学校高度重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立足山东、面向全国，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等国家及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建立和完善科研科技创新体系，通过政产学研用的创新合作，以政府、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发挥专业学科和人才优势为政府和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服务，每年签订横向委托项目100余项。学校的发展为教师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创造了良好的学术

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教育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和部署，为我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更是对高校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在此背景下，《论丛》集中反映了我校学术前沿水平、体现相关领域高水准的创新成果，《论丛》的出版能够更好地服务我校一流学科建设，展现我校“特色名校工程”建设成效和进展。同时，《论丛》的出版也有助于鼓励我校广大教师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充分发挥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推动我校科学研究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

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我们期待着山东财经大学有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问世。

山东财经大学校长



2018年12月28日

序

转型时代的中国财经战略论丛

一、贸易得益与贸易本身同样重要

社会再生产包含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自工业化以来，技术进步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分工带来专业化，专业化提升了生产效率；分工产生了交换行为，并依赖交换行为得以继续。换言之，没有交换的顺利开展就无法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进行。技术进步带来分工越来越细，参与交换的商品数量及种类就越大越多。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中国做过“交换”环节最小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实验，结果经济萎靡不振、濒临崩溃的边缘。在一国内，交换双方谁的得益多？这个问题虽然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俗语道：从南京到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这句话暗含了卖方在交换中得益多的事实。

在开放环境下，交换涉及主权国家的利益。“贸易”双方得益如何？卖方得益多？还是买方得益多？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思维分为如下四类分析：第一种，假设一个经济学意义上“大国”与一个“小国”开展贸易，通常大国得益多；第二种，假设两个国家，一个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一个采用保护贸易政策，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国家得益多；第三种，假设两个国家，一个出口工业制成品，一个出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国家得益多；第四种，假设两个国家，一个出口高科技产品，一个出口一般工业化产品，出口高科技产品国家得益多。当然以上分析是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虽然经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然而，现实情形是国际贸易给所有参与国家带来福利水平改善的同时，改善程度大小不同。

回顾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贸易结构升级就是不断追求

更多贸易得益的进程。从出口大宗矿产品、农副土特产品，到出口初级加工产品，到制造业产品深加工，再到出口高科技产品等。这一过程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嵌入全球价值链及参与国际分工程度不断深化，是出口企业面临激烈国际竞争环境下做出的必然选择。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提升过程，也是与形形色色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路程；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高涨的今天，提高出口贸易得益愈加困难；因此，开拓新路径提升出口贸易得益尤为迫切。

出口导向型战略伴随着能源和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费、高污染和产能过剩等不可持续性问题，面对班农声称的“我们正在和中国打经济战”^①，面对新兴经济体激烈竞争，提升中国“交换”得益需要多路出击。进入 21 世纪，通过多边或双边谈判来解除监管或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显露出的三个趋向值得关注：一是双边贸易谈判趋向于在贸易额、产品生产环节制度上的“对等”诉求；二是投资新规则的建主体现为鼓励投资并要求获得准入后国民待遇的努力；三是全球价值链上企业投资行为对贸易品种类和贸易模式起决定性影响，贸易和投资行为紧密协调。这成为中国企业借助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贸易高得益的关注点。从政府角度看，通过多边或双边谈判来解除监管或推行自由贸易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理性选择；从企业视角分析，通过重构全球价值链、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提升出口贸易增加值成为一种必然。

二、通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来提升贸易中的得益

豪斯曼和赫达筭（Hausmann and Hidalgo, 2014）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种类多，在国际贸易交往中可帮助其获得有利地位，而只专注于一类或几类产品或服务的国家将处于不利位置。虽然，中国出口产品种类繁多以及经济的多样性能够保证在国际交往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但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低端中间制造环节的现实抑制了出口得益的增长^②。其原因有多方面，一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化

① 班农：《特朗普正与中国打经济战》，中青在线（北京），2017 年 8 月 17 日。

② 相对于产业链“微笑曲线”中间环节（制造）而言，处于产业链上游环节（如研究、设计）和处于下游环节（如营销和零售、售后服务）的企业和国家可以获得高利润。然而，不是所有的中间制造环节都是附加值低的，如果企业生产的是手机或计算机等高科技复杂原件，而不是简单地组装，这样的企业和国家同样可以获得高的利润。2015 年作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虽然我国出口占全球的总额 14%，但贸易得益不容乐观。

起步晚；二是出口贸易结构升级步履艰难；三是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导致低端锁定；四是全球化分工加深和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发展空间受限等。上述原因使我们处于全球价值链条中间低端制造环节，在研发设计和营销、售后服务方面竞争力不足。

从贸易大国转向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是发达国家近百年走过的历程。英国、美国和日本无一不是通过全球投资成为经济霸主的。随着世界大国地位的确立，从贸易量的大国转向贸易质的大国需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只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环节发力，采取合资、独资，绿地投资或兼并重组（M&A）等方式才能更好地优化企业在全价值链上的资源配置。由贸易大国转向投资大国的好处有：一是企业可以绕过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二是贴近市场做出更快反应；三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企业资源优化配置；四是可以把国外资源与中国市场需求相结合，实现互利共赢；五是通过兼并重组实现国外企业投资人的期望值，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六是通过投资可实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

总之，参与国际分工需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这是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必然选择，是 21 世纪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重任的时代召唤。

三、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模式

到 2017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18090.4 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份额的 5.9%，分布在全球 189 个国家和地区。^① 中国在全球跨国公司投资总存量中占比 4%，低于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 15% 的比重。在众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交易中，以下情况值得深思：第一，有的企业有悖于商业逻辑盲目投资。曾尝试收购德国州立储蓄银行的中国海南航空集团宣布收购德意志银行 10% 的股权。海南航空作为航空旅游集团涉足金融业，期望通过涉足德意志银行整合德国分散的商业银行。很显然，此交易已远离自身核心业务，因为对德国商业银行缺乏了解，因此属于盲目投资。有西方媒体形象地评价此次交易——堪比实现中东和平之艰难。第二，部分企业自我竞争、错选投资时机。受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资产贬值，国内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参与海外购并。中国企业实施购并时机大多选在 2010 ~ 2014 年，而

^①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201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30 日，<http://www.fdi.gov.cn>。

这个时期受经济刺激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处于价格周期的高峰，导致企业对外收购损失巨大。第三，有的企业在国内举债，国外收购。有别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部分国内企业通过加杠杆手段参与国外收购，其中的商业逻辑让人有“如坠雾中”之感。如大连万达、上海复星和安邦集团等企业，花费巨额投资购买海外的酒店、游艇、体育俱乐部、葡萄牙银行等。第四，有的企业在对外投资项目上决策盲目，协议达成后难以履行，导致西方对中国企业轻易失约产生反感。第五，有的企业利用国家政策、转移国内资产、侵蚀国有资产。针对上述情况，国家出台了相关文件加以管制，并取得初步成效。2017年1~6月，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占同期投资总额的28.3%、18.3%、12.7%和11.4%。房地产业对外投资同比下降82.1%，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同比下降82.5%，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1%。^①

20世纪开始的英国对外投资采取的是寻找可靠代理人的模式。该模式适合英国企业对外投资，日不落帝国的殖民统治为该模式发挥到极致提供了保障。“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该模式渐渐被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所取代。借助马歇尔计划，美国企业采用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其在全球的投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如何？现在做出结论未免过早。谨慎的判断是：首先是基于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的投资；其次是对外投资与国家的外经、外贸、外交相配合；再次是把对“一带一路”投资同时与欧美投资密切联动；最后是强化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资源整合配置。因此，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新模式是一项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本书是作者潜心钻研和细致思考的结晶。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践。暂为序。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贸易增加值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和决策动机研究（15BJL083）”的研究成果。”

袁其刚

2018年9月12日

^① 商务部就201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等答问，2017年7月13日，12：56，<http://www.gov.cn/xinwen/2017-07/13>。

目 录

第1章 引言	1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
1.2 企业 OFDI 提升出口贸易增加值的机理分析	4
1.3 企业 OFDI 提升出口贸易增加值的路径分析	20
1.4 研究的内容、思路、方法	27
1.5 研究特色和价值	31
1.6 本章小结	32
第2章 企业 OFDI 区位选择、决策动机及贸易增加值的特征事实	33
2.1 企业 OFDI 的方式、发展历程及区位选择	33
2.2 企业 OFDI 区位选择和决策动机的现状	40
2.3 贸易增加值现状	45
2.4 本章小结	55
第3章 企业 OFDI 区位选择的生产率效应研究	59
3.1 研究背景	59
3.2 OFDI 区位选择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机理	60
3.3 OFDI 区位选择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估计模型	61
3.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64
3.5 本章小结	71

第4章 企业 OFDI 的决策动机与出口贸易增加值	72
4.1 全球价值链	72
4.2 企业 OFDI 决策动机对出口贸易增加值影响的机理	76
4.3 企业 OFDI 决策动机对贸易增加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79
4.4 本章小结	88
第5章 企业 OFDI 区位选择对出口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基于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视角	90
5.1 引言	90
5.2 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作用于企业 OFDI 的机理分析	91
5.3 数据处理及模型设定	93
5.4 回归结果分析	96
5.5 本章小结	105
第6章 企业 OFDI 区位选择和决策动机的政治风险分析 ——以东盟投资为例	107
6.1 引言	108
6.2 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特征事实分析	109
6.3 OFDI 理论分析和待检假设的提出	113
6.4 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116
6.5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120
6.6 本章小结	125
第7章 《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对 OFDI 区位选择和决策动机影响的 实证分析	126
7.1 发达国家的 OFDI 政策介绍	126
7.2 中国 OFDI 政策演变	130
7.3 政府在企业 OFDI 中扮演推动者的角色	132
7.4 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投资区位选择和决策动机影响的 机理	133
7.5 实证分析	134

7.6 本章小结	149
第8章 企业 OFDI 区位选择和决策动机的经验借鉴	150
8.1 日本企业 OFDI 区位和决策动机的特点	150
8.2 美国企业 OFDI 区位选择和决策动机的特点	152
第9章 结语	157
9.1 构建以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前提是融入全球 价值链	157
9.2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塑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新格局	159
9.3 重视中间产品知识要素培育的投入，提升人力资本 水平	160
9.4 强化对外投资的政策引领和服务水平提升	162
9.5 通过跨国并购方式投资全球价值链的建议	165
参考文献	167

第1章 引言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进入 21 世纪,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成效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由 2003 年的 139 个国家或地区扩展到 2015 年的 155 个国家或地区,境内投资者由 2003 年的 5163 家扩展到 2015 年的 20200 家,对外投资存量由 2003 年的 29 亿美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10978.6 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点^①;并保持了 13 年的持续增长,年增长幅度达到 33.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位列全球第三,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投资大国。普华永道在《2016 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 2017 年展望》里公布,2016 年中国并购市场无论在金额上还是在交易数量上再创新高,相比同期内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幅达 142%;内地企业海外并购投资金额为 2210 亿美元,同期增长 246%^②。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压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些现象背后是世界格局正面临深刻变化。预计未来 5 年内对外直接投资会超过 1 万亿美元规模,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是大势所趋^③。

随着“走出去”战略推进实施,不同阶段的主要目标也有所变化。

① 数据来源于 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最新数据统计,2017 年 1~10 月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计 863 亿美元,同比下降 40.9%,非理性投资受到控制。

② 冯迪凡:《2016 中国对外投资增长四成 FDI 已近 2000 亿美元》,载于《第一财经日报》2017 年 2 月 3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2-03/doc-ifafcyx6768284.shtml>。

③ 2017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 23%,为 1.43 万亿美元,而中国出现首降。来自《世界投资报告(2018)》, <http://news.sina.com.cn/o/2018-09-07/doc-ihivtsyi6007346.shtml>。

战略初期目标是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何基于国际市场需求以及经济发展内在规律来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而成为当前目标。2015 年是企业加快“走出去”的重要一年。2015 年 5 月，《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发布，“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为重点行业，分类实施，有序推进”；同时提出“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拓展对外合作方式”“提高境外经营能力和水平”等措施加快企业对外投资步伐^①。

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对外出口在 2015 年已连续 4 年未完成预期目标。不仅如此，按照国际贸易新核算体系计算出的增加值看，出口贸易质量令人担忧。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新的出口贸易增加值核算可以明确度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发达国家具有资金和技术优势，控制着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增加值的高端环节，获得最大收益。例如，美国、英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控制了产品研发、营销等生产环节，而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多从事生产加工装配环节，获得微薄利益。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全面解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和解决之道。面对新常态，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需要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实现由价值链中游向价值链上下游两端的升级。

在贸易和投资关系上，已有相关理论认为二者存在互补、替代和融合等三种关系^②：（1）替代关系模型。蒙代尔（R. Mundell, 1957）提出了贸易与投资模型。他假定：L 国是资本密集国家，M 国是劳动密集国家；在国际贸易中，L 国和 M 国将以各自的比较优势分别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 l 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m；L、M 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假定国际贸易中存在壁垒，跨国资本就会走出国门寻找最佳的效率，从而实现对商品贸易的替代。换言之，贸易壁垒是跨境投资产生的动力和基础。（2）互补关系模型。日本学者小岛清（K. Kojima, 1978）将经营资源考虑进传统要素模型中，认为国际投资不仅是资本流动，而且结

^①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6/content_9771.htm。

^② 相关实证研究在下面详细介绍。

合了人力资本、经营管理和技术的转移。日本国内的实践经验得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本国处于劣势地位的边际产业开始进行的。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把在本国即将淘汰的资本、技术转移到境外相应产业发展水平与技术差距越小的国家，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利用，同时也能充分结合东道国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进行新的创造和研发，两国比较优势的差距越大越容易为贸易创造条件。（3）融合理论。20 世纪末，跨国公司凭借其贸易和投资优势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主要力量。基于此，学者们开始关注跨境贸易与投资的融合理论。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如马库森和斯文森（Markusen, J. R. and Svensson, L. E. O., 1985）指出，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关系是否是合作的，决定了跨境贸易和投资之间关系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同期，海尔普曼和克鲁格曼（E. Helpman and P. R. Krugman, 1985）用要素禀赋差异将国际贸易分为产业内、产业间及公司内三种贸易模式，它们对应的要素禀赋差异程度依次提高。公司内对应的要素禀赋差异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分工模式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全球价值链（GVC）分工模式成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常态。在此之前，全球价值链也是存在的，但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分工模式呈现出“南—南”格局。在全球分工日益深入的今天，“南—北”格局的全球化分工日益重要，而“南—南”的合作分工模式也较以往更为常见。GVC 分工的实质是不同国家生产要素在产品生产链条上的重新整合。具体到中国而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出口？针对该问题，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研究得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出口。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探讨对外直接投资是如何提升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的。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首先要对区位和动机进行决策，回答“去哪里”和“去做什么”的问题。依据全球价值链和微笑曲线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可通过占据“产品微笑曲线”或“产业微笑曲线”的两端来提升贸易增加值；这不仅可以提升贸易质量，还影响到产业的国际布局，关乎产业国际竞争力。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明确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所在行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准确位置。以此为基础，探讨企业 OFDI 提升贸易质量的区位和决策动机范式，无疑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书旨在系统考察 OFDI 的区位和决策动机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贸易增加值,试图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对企业 OFDI 进行深入研究,打破企业在转型发展时期遇到的瓶颈,优化产业和贸易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有利位置,从而推进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的构建。

1.2 企业 OFDI 提升出口贸易增加值的机理分析

1.2.1 贸易增加值新核算方法的提出及应用

随着世界各国联系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国际生产体系诸环节中,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一种产品往往是由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生产完成的,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产生的增加值不尽相同。如何有效地测算价值链上贸易双方的增加值成为理论和实践界关注的热点。传统的国际贸易核算方法测算出口贸易的总价值,不包含中间品增值部分,同时还将进口的中间产品价值计入在内。新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是对传统核算方法的补充和修正,它有效解决了重复计算问题。WTO 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于 2011 年提出,与传统的贸易核算方法相比,贸易增加值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各国在贸易中地位以及全球贸易的运行情况。下面主要从贸易增加值相关文献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加以归纳。

1. 贸易增加值相关研究综述

随着生产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快速兴起,中间品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在不存在中间品贸易时,一国的实际收入和其增加值大致相等,而中间品贸易的持续增加,造成了大量的重复计算。以关境为口径的传统统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该国的贸易数据,不能反映其真实水平。为此,世贸组织(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 2011 年提议使用各国国内增加值的变化作为各国贸易统计的标准。此后,贸易增加值核算

方法成为关注焦点。

里昂惕夫 (Leontief, 1936) 创立的投入产出模型提供了揭开国家或地区以及各个部门之间产品生产消耗关系的工具。借助棋盘式格局, 投入产出表可以分析出产品内增值部分的来源和流向。借助于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模型, 在经历了三阶段完善后, 贸易增加值新方法成为测算贸易得益的主要工具。

第一阶段: 学者们提出了服务于垂直产业化程度测算的 HIY 方法。该方法是由哈梅尔斯、阿士和易 (Hummels, Ishii and Yi, 2001) 提出, 使用投入产出表计算一国出口中包含的进口成分和出口的中间产品被别国进口的成分, 为一国垂直产业化程度的测算提供了思路。文东伟和冼国明 (2010) 通过 HIY 方法对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进行测算。于津平和邓娟 (2014) 在对 HIY 改进的基础上, 从垂直专业化角度研究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HIY 方法在使用时须满足两个假设: 一是不考虑再进口或者第三方转口情况, 把所有中间投入品全部视为国外增加值; 二是不区分是为出口生产还是为国内消费者生产产品, 其进口中间产品的投入程度是相同的。显然, 上述假设条件与贸易现实相去甚远, 一般情况下难以满足。

第二阶段: DRS 方法的提出。为了弥补 HIY 方法的缺陷, 道丁等 (Daudin et al., 2011) 利用 GTAP 模型测算了 66 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增加值, 并追溯了增加值的来源。约翰逊和诺格拉 (Johnson and Noguera, 2012) 使用 GTAP 数据库对 2004 年的中美贸易失衡规模进行测算, 结果发现与传统测算方法相比, 中国出口贸易规模减少了 30% ~ 40%。DRS 方法虽然克服了 HIY 方法的两个假定条件局限, 但 GTAP 模型在数据测算时无法把中间品贸易和最终产品贸易区分开来。这一弊端使 HIY 方法在贸易增加值计算上存在一定问题。

第三阶段: KPWW 法的提出。该方法是由库普曼、鲍尔斯、王直和魏尚进 (Koopman, Powers, Wang and Wei, 2010) 提出的, 在 HIY 和 DRS 方法的基础上, 如何将国内增加值统计从一国扩展至全球, 从而得出一国贸易中的国内和国外增加值, 就需要建立全球多部门投入产出数据库, 把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中的增加值统计法和传统海关统计法整合。李昕等 (2013) 通过 KPWW 方法对中国贸易额进行测算, 发现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夸大了中国的贸易总额。王岚 (2014) 使用